

永恒的纪念

□张莉

在武夷山市众多的纪念性地标中,有三个地标,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它们承载着革命的记忆,也寄托着人们的情感。它们宛如历史的见证者,向我们诉说着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一段英雄的传奇故事。它们凝结着一代人用生命书写的忠诚与信仰,让我们这一代人在他们的足迹中找到自己灵魂的共鸣,朋友约它们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丰碑;不只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启迪者,必定成为我们最为持久且深远的纪念。

一个地标的百年精神嬗变

武夷山市中山路299号,是一个神圣且神奇的地方。很久以前,它是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的城隍庙;1932年以后,它叫作列宁公园。在岁月的轮回中,在相同的空间里,它曾触摸过香炉灰烬,也曾看见过红旗漫卷。从“不问苍生问鬼神”的世俗之地到“人民至上”的精神坐标,它突破百年的精神嬗变,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城隍,道教中守护城池之神。城隍信仰从南北朝时期兴起,《崇安县志》记载:城隍庙,在兴贤坊。每岁春秋二仲设主于山川坛致祭。又,祭邑厉坛则迎其神而祭之。古时候,面对“妖魔鬼怪”,官府和老百姓束手无策,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城隍爷定能保他们家宅平安,时常祭祀叩拜,以求得心灵的慰藉。这也是城隍信仰中官府之人追求“人民幸福”的重要方式之一。

时光流转,到了近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坚定不移信仰的共产主义,对“人民幸福”有着全新的定义,即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不懈奋斗的目标。至此,关于“人民幸福”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古代依赖神赐恩典,转向了通过革命创造来实现,赋予了人民大众改变命运的主体性。

方志敏是千千万万共产主义忠实践行者之一。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列宁公园的诞生,就与他的个人经历紧密相连。1922年,方志敏因无钱读书,到上海寻找工作,打算半工半读。哪知上海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正纳闷着,朋友约他至法国公园散心。走到公园门口就看见一块刺目的警示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他把这段屈辱的经历写进了散文《可爱的中国》,文中如此描述他当时的感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民族的耻辱催生了他的决心,“让劳动人民拥有自己的公园”从此成为他心中的执念。

1931年,战争形势十分紧张,方志敏排除种种困难,在他创建的赣东北苏区的首府葛源,主持修建了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公园,并亲笔书写下“列宁公园”之门匾。这座公园成为我党历史上最早建造的真正属于人民的公园,也成为方志敏爱国为民情怀的具体表达。公园竣工之日,方志敏在园中亲手栽下一棵耐严寒、抗风雨的梭梭树,象征着中国革命力量百折不挠、生生不息。

武夷山市列宁公园与葛源列宁公园是一对孪生姊妹。1930年7月,闽北革命根据地并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纳入“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框架。次年7月,“赣东北三杰”之一的黄道主政闽北苏区,他借鉴赣东北苏区做法,于1932年冬在闽北苏区的核心区崇安县的城隍庙旧址建起了列宁公园。从此,闽北人民也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公园。历经数次修建和扩建,今天的列宁公园开阔敞亮、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园内的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粟裕大将骨灰安放处、孙克骥和刘国兴将军墓与闽北著名六烈士纪念馆共同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和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人文景观;塑胶游步道、运动健身器材、儿童游乐场、休闲长廊、郭忠志愿者服务亭、工会驿站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成为闽北大地红色基因与市井温情交织的精神地标之一。漫步在列宁公园,时常可见,纪念碑前年轻身影庄严宣誓,声浪惊起飞鸟;游步道上白发老者步履矫健,追寻着青春的记忆;绿荫之下、花从之中,时尚的抖音博主设下取景框,开播进行时……

城隍庙与列宁公园,一个地标的一次命运转折,从神灵殿堂到革命广场,从缥缈虚无的祈愿到脚踏实地的抗争,二者虽跨越时空,却在“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上形成呼应。

武夷山“红场”是一个美丽的广场

在俄语中,“红色”蕴含“美丽”之意,“红场”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广场”。

在俄罗斯,红场是一个古老而著名的广场。它位于首都莫斯科市中心,辟于十五世纪末,十七世纪后半期定名为“红场”,是俄罗斯举行群众集会、大型庆典和阅兵活动的地方。俄罗斯红场最初取名只为“红色”或“美丽”之本意。十月革命之后,“红场”被赋予政治含义,逐渐成为“革命”与“共产主义”的象征。红场周边红色元素不断增加,西侧是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官的红墙,附近还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捷尔任斯基、无名烈士等墓碑及朱可夫元帅雕像,这些元素让俄罗斯红场更加美丽,使其成为革命纪念圣地,也成为世界著名旅游景点。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带来了红场文化。1931年,为迎接“一苏大会”,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建起叶坪红军广场。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在叶坪红军广场举行了红军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阅兵仪式。当晚,在广场还举行了盛大的“万人提灯会”,欢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武夷山也有一个红场,它建于1931年6月。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方志敏从红十军中抽调300多名闽北籍红军组建闽北红军独立团,返回闽北开展反“围剿”斗争。1931年4月,方志敏又亲自率领红十军第一次入闽作战,解除闽北军事危机。之后,他将自己的得力爱将黄立贵领导的红十军特务营编入闽北红军独立团中,并委任黄立贵为闽北红军独立团团长。同年6月14日,这一天对崇安苏区的军民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日子。黄立贵率领闽北红军独立团,趁着雨夜天黑,神不知鬼不觉越过城墙,奇袭了崇安县城,敌军100多人和反动民团180多人全部缴械,闽北红军独立团占领了崇安县城,端掉国民党反动派在闽北苏区中心的老窝。人民群众在红军胜利的推动下,奋起斗争,失陷的大片土地相继复得。

为了纪念“6·14”的胜利,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带领群众开辟荒山建设红场,作军民体育活动和军事操练之用。现今的红场,建有标准的塑胶跑道、足球场、篮球场和排球场,是武夷山市主要的体育活动场所,各类大型体育赛事多在此举行。

通往胜利的五九大道

1934年2月,一条由福州通往江西的省际过境干线公路开工,我们称它为福分线。这条公路在崇安县境内由南向北经过兴田、黄土、武夷、城关、洋庄、大安、分水关,全长77.5公里,其中城区地段约11公里。若干年以后,崇安城区范围的这段公路定名为五九路。以“五九”命名并非偶然,其源于崇安县的解放时刻“1949年5月9日”。20世纪90年代初,道路全面拓宽,以千年祭大环岛为界,往南约8公里地段改名为“武夷大道”,往北约3公里地段继续保留五九路名称,以作永久的纪念。武夷大道—五九路纵贯南北穿城而过,大道上每天南来北往,车水马龙,它感受着碧水丹山的活力,也见证过崇安解放的热烈。

1949年5月7日,在江西上饶花厅镇,王文波领导的闽北游击纵队与秦基伟军长领导的二野四兵团十五军四十四师会师。同月8日,四十四师在闽北游击纵队的配合下,以一三一团为前卫,一三零团、一三二团各为一路,共分三路向崇安进军。9日,从上饶花厅镇出发,经岚谷岭阳关进入崇安境内的第一路解放大军—一三零团率先攻进崇安县城。这天夜间11时许,在县城西门、北门方向,最先响起攻城的枪炮声,解放大军的队伍整齐入城,崇安县宣告解放。在渡江战役胜利后的第19天,解放军打开了福建的北大门,崇安成为“福建解放第一城”,崇安人民终于结束了23年的烽火岁月,迎来了最终的胜利。昔日饱受血与火洗礼的山城,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划破夜空,“5月9日”从此刻入一个城市的骨骼。用解放日命名道路的终极意义,并不只在于标记过去,更在于提醒我们,解放不是终点,路漫漫,还需携手向着未来勇敢前行。

岁月可以冲淡悲欢离合,却带不走一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列宁公园、红场、五九大道……它们的故事虽已远去,但我们会永远纪念那些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而流血牺牲的人。这些烙着红色印记的标识早已超越了地理标识的原始功能,它们是凝固的史诗,是城市的记忆,是躺着的丰碑。当我们在地图导航软件中输入它们时,请不要忘记,闪烁的是一个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站成永恒的光标,移动的是一个城市历史文脉与现代活力的轨迹。

武夷“都江堰”

□朱燕涛 文/摄



武夷“都江堰”

被誉为武夷山“都江堰”的北宋“清献河”水利系统工程古迹,曾为八闽翘楚,在闽北历史上亦是最早的“水美城市”工程。其中的枢纽建筑之一“临安坝”,至今让武夷山市区山光水色,浑然天成,千年来赢得了“山水古城”与“金崇安”的美誉。“山光水色”的“山”即崇安古城西郊屏列的丹霞岩群峰,旧称“西山”,今名“小武夷”公园,“水”即迤迤城东2000余米的古代人工湖,百姓称之为“大溪塘”“临安湖”。临安湖的激滢“水色”颇名意义仰赖北宋的“临安坝”古堰造就。古堰是条长带状滚水坝,崇溪河水从石堰上洩漫而下,在宽阔而拱曲的坝面上湍流成雪白的水花并发出清脆的喧响。如果说,临安湖是一架翡翠色钢琴,那么白龙过江般横亘于碧潭东南的临安坝,便是这架巨琴上雪亮的琴键,至今不舍昼夜地弹奏着武夷山千年沧桑悲欢跌宕的史诗乐章。

多年前的一天,笔者在兴田镇城村村采风,于村中赵氏宗祠的一位村民手上看到一套清刻版《古粤赵氏宗谱》,不经意间翻阅到一篇《宋贤传略·赵抃》文章,其中提到这一水利工程。

赵抃是武夷山古代政绩卓著的一任县令,是百姓至

今耳熟能详并被神化了的人物“清献老爷”。他在北宋崇安(今武夷山市)建县(994)后的第46年(1040)上任知县,极重视并善于兴修水利。史册记载,他先后履职过闽、赣、川等地及朝廷,累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级)。为官以执法严明,政绩卓越与生活清廉著称,为戏剧人物包公的主要原型,人称“铁面御使”。成语“铁面无私”“一琴一鹤”即出自他廉明事迹的典故。据明代县令、文学家邱云霄《传略》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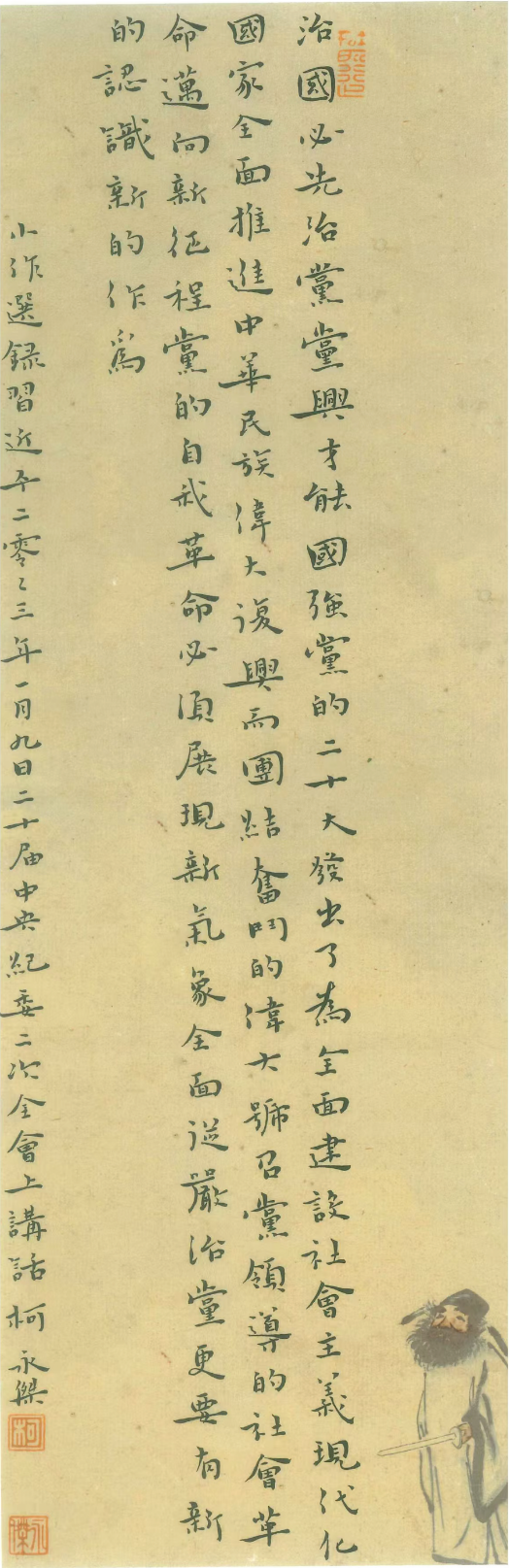
崇于淳化始升县,维时荒度未徧(遍),安养未周,虽附郭平旷之土,民有目为旱区而弃之者,盖以土高水下,滋灌不逮也。公至,相地度宜,垫阜而渠,引治西之流,贯中城而南十里,俾坟壤为沃区者万馀(余)亩。当公凿渠之初,撤徙民居,民有怨之者,公谕以诗云:“撤屋变成河,思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盖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公权之,益已熟矣。迄今,民戴公泽,久而勿替,乃名其河为“清献河”,志不忘也。……

在旧崇安县水路交通第一站和商旅要津,有“淮溪首济”之称的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村,赵氏是该村三大

姓之一,其宗祠建筑保护至今相对完好。赵抃作为本县历史上政声最高的“父母官”,该村赵氏百姓引以为自豪,倍加崇敬,因此不仅将他收入赵氏宗谱,且在宗祠中进行供奉。南宋县令还在县城文庙旁为他建了首座专祠,并特请当年的朱熹为该祠撰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创祠“记文”。此记文随朱子的声名流传朝野,推动了全国府县在文庙设立乡贤祠字制度的形成。之后,在崇安县城内,有记载以赵抃谥号命名的文物,除了《传略》中提到的“清献河、清献梅、清献亭、清献碑、清献祠”外,还有清献坝、清献桥。这些纪念物虽然当前仅残存下“清献坝”和“清献祠”,但今天的武夷山市清献街、清献村、清献社区、清献小学等命名,持续地表达着对这位先贤的崇高敬意与“志不忘也”。

“清献河”是一套水利工程网络,是武夷山有史籍记载的最著名的古代系统性水利工程。其规模既包括从崇安县城西北石雄开始的陈鸿陂、灌溉西门堰和横穿城区的河渠及灌溉南门堰的田垌等水网,还包括在城东河湾顺势截流的临安坝(新阳陂)及其所形成的青龙潭、青龙码头及向南绵延十里的“新阳圳”与灌溉如今机场区域的4000多亩新阳堰中的沟渠。这一系统工程,使崇安超过万亩的粮田实现了旱涝保收,数万的城乡人口生活用水得以保障。后任的南宋崇安知县王齐兴在一次视察新阳渠中,感慨赵抃的功德赋诗道:“唯有新阳陂上叟,终年饱饭已忘饥”(清康熙《建宁府志》)。如今城内的古渠其实只是清献河的一小部分,属于“北清献河”;临安坝至新阳的长圳,同样也称“清献河”,属于“南清献河”。文献中发现,在赵抃赴任崇安前,县城西北的石雄事实上已有“陈鸿陂”,但是年久失修淤塞荒废了。赵抃到任后,广招贤才,励精图治,重新疏浚并扩展了陈鸿陂及其渠道,使其在灌溉西门堰后穿城而过灌溉南门堰。在修通北清献河后,赵抃一鼓作气,又在城东新筑临安坝。临安坝及其长渠,工程之浩大、精密与艰辛,并不亚于陈鸿陂至南门堰的工程,创造了古代闽北地区水利工程体量最大、输水最长、获益最广等多项纪录。

临安坝的结构科学,形态美观,是数千年农耕文明中先人合理利用自然、因势利导开发水力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天人合一”文化的活化石。此坝的安全设计与施工都相当科学。例如在坝体的走向设计上,它不是横截河流、当冲筑坝,而是在河流拐弯处斜切河湾,顺势筑堰,极大地规避了洪水的正面冲击。与此同时,坝体还设计成宽阔低矮的卧坝,并且迎水面为斜坡状、朝天面为前仰后俯的拱曲状,十分符合现代流体力学原理,让水流特别是洪流及其所裹挟的沙石可以很



柯永杰 书

顺畅地滑堰而过,却不对背水面的坝基构成下淘威胁。这一设计同时还实现了“保安功能”,即让不慎落水的人或牲畜在漂流到坝沿时不会被撞伤;当漂至坝下时也不会严重跌落摔伤或被涡流卷困而淹毙,极为人性化。

临安坝的设计还衍生了系列诗情画意的美学意境:一是由粗大石块干砌的拱曲坝面,激溅出了雪白的水沫,养眼又悦耳;二是银练般的长坝如白龙过江,包括其南段的弧形坝体,让“白龙”更增添了一抹生动,形成了游龙摆尾的传统审美意象。更重要的是,临安坝高程的定位及十里长渠的设计和开凿的科学性与高难度,体现了宋代在测绘技术上的精准与施工技艺上的精湛。临安坝所蓄之水通过横穿半岛状的师姑洲而向南凿筑直达新阳的十里长渠,据说其落差竟不足三米,其测绘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崇安《邱氏宗谱》记载,赵抃当年到任伊始,求贤若渴,遍寻人才,在岚谷黎口村寻访到一位通晓风水堪舆地理的贤达丘纯,人称“丘神仙”,就如何解决崇安多旱田多火灾问题三顾茅庐。丘纯为其所感动,领着赵抃登上西山峻巉岩(今小武夷公园白花岩)顶,提出引西溪贯城并溉田的“以水克火”之计。赵抃如醍醐灌顶,深以为然,即诚聘丘纯为总董,全权负责这一伟大工程。丘纯不负重托,最终完成了这一壮举。

赵抃之后的宋、元、明、清等各朝官府,均对这一系统水利工程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与完善,使其总体格局与形制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未作大的改变。其中主要的坝坝、主渠至今仍然存续或可寻踪迹。

清献河是集勇气与智慧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它的建设之“益”,不仅仅体现在灌溉农田“万余亩”,而且还体现在串联了许多重要的“民生功能”。如它“流经中城”,给崇安古城增添了如“丽江古城”般的水乡风景。而今残存于北门片区的一段清献河,还依稀可见这一古风悠悠的情景。在北宋至20世纪末,城区的清献河更有现实意义:它有机地化解了古城抗旱排涝的大难题,解决了居民饮水流洗的窘境,克服了城市消防、疏散问题。清献河水还驱动了城区的多座水碓、磨坊,解决了人畜粮食饲料的加工。

清献河在发挥“民生功能”的同时,还兼具独特的“环保功能”,是“循环经济”“生态效益最大化”的典范。崇安旧城较小,水流量约一两个小时便穿城而过。传说清献河建成后,作为县令的赵抃对清献河制订了许多規約,其中的“分时用水公约”便十分“环保”:清晨挑水,上午洗菜,中午洗碗,下午洗衣,傍晚洗澡,夜晚刷马桶(这一乡规民约后来成为习俗,直至文革后才被废除,清献河污染此后也日甚一日)。因此,当清献河流出城廓时,“生活污水”便成了“肥水”,“肥水不外流”,灌溉完南门堰稻田后,余水汇入“南清献河”一路灌溉到新阳陂。南门堰、新阳堰稻田由此肥得青黑油亮,不仅旱涝保收且年年丰产。崇安百姓因此称所灌南门堰田为“羊肉碗”。